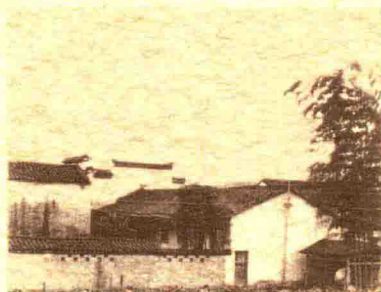


重寻徽州

——
转型期徽州乡村的民间记忆与民间书写

刘伯山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重寻徽州

——转型期徽州乡村的民间记忆与民间书写

刘伯山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寻徽州：转型期徽州乡村的民间记忆与民间书写 /
刘伯山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495-7147-5

I. ①重… II. ①刘… III. ①乡村—社会变迁—
研究—徽州地区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392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62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36 字数：527千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受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本书出版受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
创新中心立项资助

主编简介



刘伯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带头人,兼任安徽省黄山文化书院院长、安徽省徽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是哲学与徽学,先后在《学术月刊》、《光明日报》、《文史哲》、《历史档案》、《伦理学研究》、《中国农史》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出版了《徽州文书》五辑共 50 卷,其中《徽州文书》第一辑 10 卷 2007 年获首届中华优秀图书奖,《徽州文书》第一至三辑 30 卷获 2009—2010 年度安徽省政府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徽州文书》第四辑 10 卷获 2011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

徽州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及其影响

——代前言

刘伯山

徽州传统社会发展到清中期以后进入近代社会,社会在转型。这一过程严格说来是清同治年间才真正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徽州社会的近代化主要体现在人文精神方面。受自身因素的制约,其近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甚至严重受阻,转型极不充分,结果导致传统一直在延续,传统文化在今天大量遗存。

一、徽州传统社会的特点

学术界对“近代”、“近代社会”及“近代化”的概念持有不同的意见。笔者在这里无意介入争论,而是直接将“近代”理解为古代至现代的中间代;“近代社会”是指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过渡社会;而“近代化”则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

要研究徽州社会的近代化,首先就要了解徽州传统社会的特点。

徽州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但由于区域社会自身的特点,成熟的徽州传统社会严格说来还是南宋以后才真正形成,明清时获得

充分发展的。^①除了具有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之外,徽州传统社会自身还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程朱理学影响极大

徽州是“程朱阙里”。“程朱之学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学宫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举而合祀之,则独吾歙。……朱学原本二程,二程与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黄墩徙,故称程朱阙里。”^②“程朱三夫子,一自婺入闽,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黄墩。”^③理学特别是朱熹的思想在徽州影响至深至彻,“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正如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中所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④程朱理学的思想浸透在徽州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徽州社会构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进而兼容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区。

2. 宗族社会极其繁荣

徽州是个宗族社会。人们聚族而居,保持血统,强化宗谊,所谓“人必有姓,姓必有族,族必有宗”,宗族、宗法意识极强。明嘉靖《徽州府志》就记载:“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⑤明休宁进士赵吉士也记载:“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⑥为强化统治,各宗族还采取了建祠堂、置族产、修谱牒等方式以敬宗收族。每一个宗族都将宗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为最高利益代表,将“亢吾宗”作为

^①徽州本是一个移民社会,早期生活的土人是越人,东汉末期以前的时代是落后的山越时代,之后至北宋末期是展开封建化进程的新安时代,宋宣和三年(1121年)设了徽州府后才进入属于典型封建社会的徽州时代。参见刘伯山《徽州文化及其研究价值》,《徽州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2002,第13—17页。

^②清雍正乙巳年(1725年)重刻《程朱阙里志》卷之一,鲍应鳌序。

^③清雍正乙巳年重刻《程朱阙里志》卷之一,刘伸序。

^④清休宁吴翟:《茗洲吴氏家典》,李应乾序,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本,第4页。

^⑤明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第69页。

^⑥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刻本。

宗族发展的最高追求,由之规束、带动和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

3. 社会结构极其稳定

徽州是一个礼、法兼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社会关系的处理以礼仪为先。“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丘,尊卑少长以齿。此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①如果发生了纠纷,徽州人一般不是采取械斗等暴力手段加以解决,而是首先进行协商,以协议的方式处理;再就是通过祠堂、乡约、文会等,进行一种社会的调解;最后就是采取诉讼方式,以维护各自的利益。故徽州首先是个“礼仪之邦”,社会关系的处理惯例又使它成为了一个“契约社会”,矛盾和纠纷的终极解决方式的选择又导致了徽州人的“繁讼”和“键讼”,由此动态保证了徽州社会的长期稳定。

4. 历史文化极其发达

徽州自南宋以后,文化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至明清达到辉煌。流派纷呈,仅历史上确其实、有其名的就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派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剧、徽菜、徽漆、徽墨、歙砚、徽州三雕艺术等;人才辈出,历史上有文献可证的杰出人物就达 5000 人之多;再如徽州的契约理性、宗法伦理、土地制度、佃仆制度、风俗信仰、风水礼学、人口迁徙、方言俚语等也无不特色鲜明。徽州文化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投影,又是典型缩影,从而具有了标本的价值与地位。^②

5. 经济结构的双重构成

徽州地处江南,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本土经济的主体长期以来都是赖以山林的山经济^③，“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④。由于“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

①汪道昆：《太函集》卷一《黄氏建友于堂序》，明万历刻本。

②参见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③参见刘伯山《论经济：徽州本土经济的主体》，张脉贤、刘伯山等编《徽学研究论文集（一）》，1994年，第22—31页。

④宋淳熙罗愿：《新安志》卷一《风俗》，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刻本。

也”^①，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②。南宋以后徽商崛起，明清时达鼎盛，足迹遍天下，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的经营主要是一种徽州人走出山门之外而远走他乡的两头在外的经营，它带给本土的一般是钱财的输入，这就增置了本土的消费型经济，形成徽州本土经济结构的双重构成局面。

6. 人口的高移民输出

正由于徽州是地狭人稠，“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灿，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烘壅缉栲，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③。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来”，人们“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④。这就导致徽州人的高移民输出，以此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具体途径，一是读书以科举及第，再就是经商。特别是经商之风在明代中期以后构成了一种社会习俗。

二、清中后期徽州传统社会发生的几个变化

清中期以前，徽州传统社会一直十分稳定，之后则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

1. 男丁劳动力不足

明中期以后，随着经商之风的兴盛，徽州大量的男丁人口外出经商，同时带走大量的资金，以致形成“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⑤的局面，久而久之就给本土带来了社会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男丁劳动力缺乏，本土的农业和林业生产发展受到制约，从而传统的山林经济长期以来只有量上的变化而在质上得不到长足发展。如祁门县的环砂村是程氏家族聚集地，遗存有《祁门环砂程氏文

①清道光《休宁县志》卷之一《风俗》。

②清道光《休宁县志》卷七《汪伟奏疏》。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本。

④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六，李明回等点校，黄山书社，2001，第930页。

⑤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序》，明万历五年（1577年）王氏世经堂刊本。

书》1383份,其中最早的为《明宣德四年四月王仕贤立卖山赤契》,最晚的一份为《民国二十年十一月汪松九等立承佃山约》,总时间跨度为502年。^①从这些文书可以看出,明代后期以后,程氏家族的山场已需要承租给外人来经营,从而遗存下来大量的出佃文书和承佃文书。这其中,出佃文书44份,最早的一份是《明崇祯四年七月山主程与缙等立出佃山约》;承佃文书291份,最早的一份是《明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汪天祖等立承佃山约》。其二,人口结构不尽合理,本土长居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制约。其三,经济资本缺乏,使得本土的商业和产业经济得不到大的发展。

2. 徽商的衰落

清中期以后徽商开始衰落,特别是在清嘉庆道光以后,衰落的迹象十分明显。它表现在各个方面,涉及许多行业,尤其是占主导的盐业衰落最厉害,近乎是从此退出历史舞台。^②这就对徽州本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一是由徽商支撑的本土消费型经济趋于终结,山林经济重占主导。其二是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和信心遭受打击,经商之风遂减,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趋于安于现状的保守。

3. 棚民的迁入

明代后期以后,由于徽州本土农林生产劳动力的缺乏,许多山场抛荒,于是周边安庆、池州及江西等地的人就纷纷涌入徽州,或承租,或抢占山场,搭山棚、垦山地、种玉米,成为“棚民”。此在清道光、咸丰、同治期间达到高潮,举凡祁门、休宁、黟县、歙县等地都有棚民居住。棚民的输入最初是要解决徽州本土的劳动力的缺乏,但在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就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一是生态问题。由于棚民的开山种地,主要种植的又是不利于水土保持的玉米,因此造成许多地方水土流失,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清乾隆中后期以后,徽州发生了许多禁召和驱逐棚民案。如《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棚民种山碑》就明确指出:“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不惟山遭残

^①收入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6—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参见叶显恩《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第57—63页;王廷元、王世华《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第447—475页。

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国课奚供。况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哨聚成群,恐贻害匪浅。……公吁俯鉴下情,赏示严禁,勒石垂后。”《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私棚民入山垦种碑》再次强调:“嗣后,如有不法之徒,故智复萌,混将山业私召异民入境,搭棚开种苞芦,为害地方者,许该处地保山主邻佑查实,指名禀县,以凭立拿究,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①其二是文化问题。这些棚民来自不同的文化圈,有着不同的方言、习俗和生活习惯,移民到徽州后,与徽州主流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摩擦,直至产生交互的影响,冲击着徽州自身的传统。如在语言上对徽语的影响就很大,像屯溪方言中“着”的使用及以“着”代“了”、“着”与“了”相通等,探其来源,就是安庆官语向屯溪土著方言渗透的结果。^②其三是社会问题。徽州本是地少人多,棚民的大量涌入必然要挤占徽州人的生存空间,加上文化背景的不同,摩擦和纠纷难以避免,增加了徽州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4. 战争的破坏

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政府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对徽州本土造成的影响最大。从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开始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徽州就一直是清军与太平军拉锯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战火蔓延了各县,从而给徽州本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一是大量士民死于战乱及战乱之后的饥荒和瘟疫,徽州人口锐减,甚至造成本土“男丁百无一二”^③。其二是许多村庄被毁、房屋被烧、财产遗失,“颓垣碎瓦,填塞于河”^④。徽州本土历来鲜有兵燹,这是唯一遭受大规模破坏的一次,千年厚积毁于一旦。

上述四大历史变化都集中在清嘉庆至同治年间,叠加的结果,表征的是传统已经遭受破坏,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自身的裂痕,徽州传统社会开始衰落。

^①两碑现嵌立于休宁县龙田乡龙田村村中。

^②参见钱惠英《屯溪方言中的“着”——官话方言向土著方言渗透的又一例证》,《徽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36—40页。

^③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五册“婚姻类”,中华书局,1986。

^④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

三、清末民初徽州人的自我认识

徽州传统社会在清后期已经呈现出衰退的趋势,特别是太平天国兵燹给徽州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辉煌仿佛成了过去。但生活还要继续,历史还要发展。徽州人痛定思痛,开始正视现实,清理历史,了解和把握他们的现状。于是在清同治以后至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徽州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自我认识运动。

1. 谱牒的重修

兵燹造成了许多徽州人的死亡和流离,但徽州社会的基础还是宗族社会,了解自己宗族的劫后余生情况,重新收族,成为每一个宗族的一件大事,于是在清同治以后的一段时间,徽州人大兴家谱重修之风。婺源源的《腴川程氏宗谱》就是清同治七年(1868年)续修的,序中写到:“咸丰癸丑,粤匪肆扰皖南,我婺遭劫殆遍,本里亟被蹂躏,奔走流离,人无生意,遑问谱系……戊辰春,会议设局续修。”^①黟县北部有一支吴氏族人,其族谱在太平军乱时被毁,之后一直想重修,终于在民国甲子年(1924年)完成,序中写到:“予族自牛公迁居塔上,传至三世,分为二支,……诂意劫遭红羊,致令三百余年之掌记,一旦化为乌有。……今春予业师吉人兄,因宗姓之日繁,忧家谱之未修,提议编辑,出其珍藏古谱,奉为范模。”^②

2. 财产的清理

兵燹造成徽州许多家庭财产遗失,特别是契约文书很多被毁,于是在战火平息之后,人们要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以了解自己的家底。笔者在收集抢救徽州文书时就发现,农户家保存的文书一般是被文书主人叠成小长方块,用包契纸包着,放在木箱子里的。包契纸里所包的文书有的是一份,有的是好几份;包契纸上有的有文字说明,有的没有。如果同一个包契纸里是包着几份文书,则这些文书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内在关系,属于一种归类。这种有分类的用包契纸包契的行为就是历史上

^①清同治七年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序》卷一,程瑞《戊辰续修腴川程氏宗谱序》,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

^②民国甲子年《黟北吴氏族谱底册》,吴美熙《吴氏族谱叙》,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

一种对文书的整理行为。通过对目前已发现的包契纸的分析、鉴别及考究它上面所注的内容,可以知道,历史上徽州人对文书的整理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清同治至光绪年间,还有一次是在民国早期。前者是兵燹后对财产的清理,后者则是民国改朝换代后对财产的确认。如《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共有 280 份,其中包契纸有 27 份。^①从包契纸的纸张和上面所注的内容看,它们当是在同治后期和光绪早期所作的行为,但后期有变动。2002 年 2 月笔者在屯溪老街寻获到《歙县三十七都三图许氏文书》共 73 份(册),其民国七年(1918 年)桂月许立贤订立的《置产簿》上就记载了许立贤在民国初年整理其家庭契据、文书的情况,如“实征归户一本;阉书一本;许云清、胡连宝老扒坑贰张;立存膳荣之业合同契一纸,祖父留根;许廷玉卖契一纸,土名高冲岭熟地赤契,许新高寄查;许大德、大为卖孙姓当契,土名松儿坞,赤、当、卖契共三张。又云租批一纸,现在失去。”^②

3. 乡村的调查

兵燹后,除各宗族、家庭要了解家底外,官府和社会也加强了自我摸底式认识,开展了乡村调查,内容包括地理、风物、习俗、语言等。如清同治六年(1867 年)黟县进行了全县户口调查;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婺邑畅纪公司印制活字本《婺源地理教科书》;清同治至光绪年间徽州还印制了《新安风物志》等。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是清宣统元年(1909 年)徽州知府刘汝骥主持的徽州民情之习惯调查。它以县为单位,制作统一的调查格式,委派各县“学识兼优,热心公益”的士绅分任^③;然后各县成稿,相对独立,如《振均公遗墨》就是祁门的调查,最后由刘汝骥核实,汇编成《陶甓公牍》,计 12 卷,宣统三年(1911 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④王振忠先生指出:“徽州府的此次调查,主要是通过当地士绅,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调查有着固定的格式,形成的报告内容也就颇为详赡、可靠。笔者

①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 1 辑第 1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 1—352 页。

②参见刘伯山《我与徽州文书的寻获(中)》,《徽学丛刊》2005 年第 3 辑,第 133—151 页。

③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科·申送六县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报告册文》,《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第 578 页。

④影印本见《官箴书集成》第 10 册,黄山书社,1997。

以为,这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详尽的一种文献,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①

4. 方志的编修

官府和社会自我认识的一项突出成果就是编纂出版了一批县志、乡土志和乡镇志。如同治八年(1869年)祁门知县周溶聘海阳进士汪韵珊续修县志,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同治十年(1871年)黟县知县谢永泰主修《黟县三志》;光绪八年(1882年)婺源编写县志,至民国九年(1920年)又再编。光绪三十四年,董钟琪、汪廷璋编纂的《婺源县乡土志》(七章)刊刻出版,此后不久,李家骧编纂的《祁门县乡土地理志》(不分卷)也相继付梓。民国期间,婺源、歙县、绩溪相继完成了县志,歙县完成了三部乡土、乡镇志;1944年祁门胡光钊刻印了《祁门县志艺文考》和《祁门县志氏族考》等。

5. 徽学的兴起

清末民初徽州人还开始了对自我的自觉认识,出现了不少研究家乡历史人物和文化流派的文章、书籍。如1907年黄质在《国粹学报》上连载发表的《滨虹臚抹》之《叙摹印》,谈到了徽派篆刻;1915年吴士鉴在《中国学报》发表《纂修清史商例》,谈到了徽州商人;1919年陈去病撰写了《徽商便览》等。徽学研究的序幕也就此拉开。^②

四、徽州社会近代化的举措

中国的近代社会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教训而进入,徽州社会的近代化尽管是伴随着国家和民族的近代化脚步而整体推进,但真正的开始还是在遭受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破坏之后。考察徽州社会的近代化举措,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近代徽州对先进文化意识的接受

徽州虽然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但对外界先进文化和意识的接受还是

^①王振忠:《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陶甓公牒〉之民俗文化解读》,《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第127页。

^②参见刘伯山《徽学研究的历史轨迹》,《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第43页。

比较通畅和及时的,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清末以后徽州人书信频繁。清后期徽商尽管有所衰退,但经商的人士毕竟还是很多,他们与家乡都有密切的交往,其中书信是重要的方式。徽州早在明代就有“信客”、“信使”,传递着大量的信函。清后期邮政事业有所发展,徽州本土创建邮局是比较及时的,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歙县创办邮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祁门县邮局成立,宣统二年(1910年)歙县深渡设立电报局等,信函的来往就更加密切。黟县宏村有汪、万、吴等姓,其中汪是大姓。2000年5月笔者在该村获得《黟县十都宏村汪氏文书》计210份,其中有9通清末民初的信函,现藏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2002年笔者在该村又获得万氏信函近60通,年代为清末至民国,主要是在浙江兰溪经商的宏村万氏与家人的通信,涉及了几代人,内容除了诸如报平安、通人情之外,还包括子女教育、资本融通、商业经营、商品价格、时局、世风等,现藏笔者处。黄山市的吴敏先生也收集到了清道光年至民国末年徽籍商人的信札2000余件,其中黟县商人王家瑞兄弟俩的10余件信札涉及了徽商“卖官鬻爵”、“捐翎”的内容。^①

(2)清末以后徽州人对时尚报刊的订购。徽州虽然地属偏僻的山区农村,但文化底蕴深厚,外出的人多,因此对外界新鲜事物的接受也很快,大凡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所办的一些报纸和刊物,总有许多人订阅和购买。对此,笔者在收集抢救徽州文书的过程中多有发现。如刊物,目前笔者收藏的就有上海生活周刊社主办的《生活》民国十九年(1930年)第5卷第4期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第6卷第5、6、48期;杭州黄钟文学社主办的《黄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1卷第15期;《时兆月刊》民国二十年第5期;《中国工业杂志》第9卷第10期;上海编辑人协会主办的《文化战线》旬刊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第5期等。报纸更多,许多原是徽州人用作包契纸的,如《黟县十都丰登江氏文书》中就有一张包契纸是民国四年(1915年)11月12日上海的《申报》;《歙县十八都郑氏文书》的

^①参见吴敏《发掘近百年来徽商信札史料侧记——附录王家瑞、江耀华等商界名人书信十八通》,《徽学丛刊》2004年第2辑,第166页。

包契纸除了民国《徽州日报》外还有一张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上海的《新闻报》;祁门一户人家的文书共有10余包,全是民国十几年《新民报》等。这些时尚的报纸既然被徽州人用作了包契纸,至少说明它们当时在徽州已是十分普遍,人们不以为贵。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还藏有《清光绪芜湖〈商务日报〉档案》计23份,有《清光绪三十一年六月芜湖商务日报处等立合议草底》、《清光绪末年芜湖商务日报稟请商务局宪文稿》、《清光绪末年芜湖商务日报登记账目规定草底》等,系笔者2000年2月20日在黟县宏村获得。该档案既被黟县人留存至今,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商务日报》与某个黟县人关系紧密,甚或是创办者之一。

(3)近代徽州兴办报刊之风。徽州人不仅要订购报刊,更是要自己创办。民国元年(1912年),屯溪的共和党人在屯溪就创办了《新安报》,此为目前已知徽州最早的地方报。民国二年(1913年),歙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编辑出版校刊《黄山钟》,后随学校迁到休宁万安;同年,歙县人还在县城创办了《徽州新闻》。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京高校的黟县籍学生舒耀宗、王同甲、欧阳道达等人组织了黟麓学社,创办了《古黟新语》;同年,休宁省立二师和歙县省立三中在休宁组织“徽州二三同学会”并创办了刊物,宣传民主。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22—1931年),在上海和芜湖从商的青年余一晨、汪励吾、汪晋侯、舒人文、陈默若等组织了励志会、黟社和同乡会,创办了《黟山青年》、《乡潮》、《黟声》、《双溪潮声》。民国十四年(1925年),歙县新安少年俱乐部编辑出版了《先声报》、《新声月刊》;稍后,休宁隆阜的安徽省立第四女子中学的师生创办了《徽音》、祁门县立小学的教师创办了《阊潮周刊》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徽州本土所办的报刊更多。^①

接受了先进文化意识所导致的就是人们思想观念要发生变化。据笔者的考察,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政治敏感。徽州尽管地处封闭的山区,民国时的本土经济已是比较落后的山区自然经济,但徽州人的政治意识并不落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政治的关心丝毫不亚于当时中国的一些大城市。1919年北京爆

^①参见《黄山市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市报业志》,黄山书社,1998,第295—304页。